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伟大的说服

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

(美) 安格斯·伯金 / 著
傅瑞蓉 / 译



哈耶克捍卫自由市场的雄心
与弗里德曼天才说服能力的完美结合
造就两代思想家传播思想和推动变革的传奇故事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美) 安格斯·伯金 / 著

伟大的说服

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

(美) 安格斯·伯金 / 著

傅瑞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伟大的说服: 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 / (美) 安格斯·伯金 (Angus Burgin) 著; 傅瑞蓉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1
(西方经济·金融前沿译丛)

书名原文: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ISBN 978-7-5080-9091-7

I. ①伟… II. ①安… ②傅… III. ①自由市场—市场经济学—研究 IV. ①F014.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6147 号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by Angus Burgin

Copyright © 2012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2529 号

伟大的说服——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

作者 [美] 安格斯·伯金
译者 傅瑞蓉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印 张 20
字 数 315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序言

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1924年秋末的一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大步跨进了牛津大学考试中心（Examination Schools in Oxford），大声地宣布：文明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正在走向一个终点——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而这也正是他这次演讲的题目。虽然当时凯恩斯才41岁，但是，他在很多领域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点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当中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他还参与了大学内外各种实际的事务。凯恩斯生于名门，他的家庭是剑桥学术圈子的核心。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后，在25岁那年，凯恩斯获得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优秀奖金，而且在之后的不到3年的时间里，他又被任命为《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的编辑。在另一方面，凯恩斯作为一名公职人员的职业生涯也是一帆风顺的。他从担任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的低级文职人员开始一路晋升，直到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出任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如今，他致力于发展一个连贯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取代渐趋衰落的从20个世纪传承下来的陈旧学说。^①“我们现在还无法在一支新的曲子下跳

① 关于凯恩斯的背景，请参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撰写的三卷本《凯恩斯传》，第一卷为《希望的破灭：1883—1920年》，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二卷为《作为救世主的经济学家：1920—1937年》，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三卷为《为自由而战：1937—1946年》，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0年出版。

舞，”凯恩斯告诉与会者，“但是，某种变化正在悄然降临。”^①

凯恩斯相信，声称要捍卫自由放任主义的那些人曲解了自由放任思想，他们实际上是想在“自由放任”这个名目之下贩卖自己的观点。“不管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还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抑或是在马尔萨斯的著作中，都找不到自由放任这个词，”凯恩斯提醒他的听众，“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曾以任何一种教条主义的形式来表达过这种思想。”他认为，事实上，它只是代表了“普及者与庸俗化者们想宣扬的一些东西”。^②这些倡导者们有意地把斯密等人的思想简化为某种抽象的经济概念，力图把“自由放任”的思想观念传播给那些没有专门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理解能力有限的普通大众。^③公众消化吸收了这些严重缩水的“教导”之后，开始“把这种简化的假设看成是健康的，而把更深层次的复杂性看作是病态的”。^④其结果是，使流行的假设与严谨的学术观点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鸿沟。尽管自由放任思想一直深受大众欢迎，并且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它，但事实上，五十多年来，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在对待它的态度上，用约翰·艾略特·凯尔恩斯的话来说，那就是，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便于在实际中运用的原则”而已。^⑤凯恩斯指出，自由放任思想的适用性面临着一系列“复杂性”的挑战。他还说，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同这种看法，并且试图在他们自己的理论分析中把各种复杂因素结合进去。凯恩斯列出的“复杂性”包括：“当存在企业一般管理费用和合作费用时”，“当内部经济走向使生产发生聚集时”，“当调整所需的时间较长时”，“当愚昧盛行、知识匮乏时”，

读者也可以参阅由哈罗德撰写的、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于1951年出版的《凯恩斯传》，以及彼得·克拉克撰写的评述凯恩斯主义的著作《风起云涌的凯恩斯革命》，该书于1988年由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

- ① 参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伦敦：霍加斯出版社，1927年出版，第5页。凯恩斯先后于1924年在牛津大学的悉尼·鲍尔讲座（Sidney Ball Lecture）上、1926年在柏林大学发表了这个演讲。
- ② 同①，第17页、第20页。
- ③ 同①，第32页。
- ④ 同①，第33页。
- ⑤ 请参阅约翰·艾略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文集：理论与应用》，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873年出版，第244页。

“当垄断和联合干扰了交易的公平性时”。^① 这些内容涵盖了自由企业经济的绝大部分内容。换句话说，它实际上意味着自由放任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只是公众尚未知道而已。

凯恩斯认定，自由放任思想在知识层面上是彻底失败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一直广泛流行呢？凯恩斯指出，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与自由放任主义对立的两个主要学说——保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使得自由放任思想的倡导者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来摧毁这两个学说。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丝毫不予同情，而且还惊叹：“为什么一个如此不合逻辑、如此沉闷的学说，竟然能够对人们的心灵施加如此有力的、持久的影响，并通过这些人来影响历史的进程呢？”^② 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复杂或简单的理论，试图克服公众喜爱自由放任思想的偏见。然而，那些倡导市场机制受复杂约束条件调节和限制的经济学家们，在修辞上就会处于明显劣势。而且，正如现实世界中经常会出现的那样，如果某种观念之争演化成了抽象的概念之争，那么概念上非常纯粹的自由放任思想就会比同样简单化的对立思想更容易被接受。其次，这种支持自由市场的假设还“迎合了当时商界的需要和希望”。^③ 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得到了富裕且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赞助者的支持，后者总是能够确保他们的声音能被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听到。

凯恩斯确信，尽管自由放任思想具有内在的优势，但是它已经渐渐地失去了在公众领域的支配地位。他非常确信这一点。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经济思想必定能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实践当中去。他相信，总有一天，经济学家们将会几乎一边倒地批评自由放任思想，而且这种批评将会被公众广泛认同。或许更重要的是，工商企业的制度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它们的利润动机已经开始趋于缓和了。在凯恩斯看来，应该鼓励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管理权的相互分离，不要再过于强调向所有者发放红利。管理层应该更关注顾客或者公众的潜在批评，尤

① 请参阅凯恩斯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第32~33页。

② 同①，第34~35页。

③ 同①，第36页。

其对于后者的批评更应该优先考虑并作出相应的改进。企业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使自己社会化，”凯恩斯下结论道，“从细节上来看，社会主义反对无限制的个人私利的斗争每时每刻都在取得胜利”。^①当代经济思想与制度实践都越来越不利于自由放任的经济假设，这个假设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如今已经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凯恩斯把自己对自由放任思想的攻击比喻为对一只“昏睡的怪物”的攻击。他说，它是“凭借其世袭的权力而不是个人的功绩来统治我们的”。^②凯恩斯毫不怀疑，这只“怪物”将会被杀死。

凯恩斯终其一生都没有全面阐述过自己的政治观点。虽然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这个演讲中，他曾经表示要对他全新的社会哲学做出详细阐述，但是正如他杰出的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当作凯恩斯主义的宣言，那就太过于简略与不完整了。^③凯恩斯的这次演讲也许是重要的，但是在这样一个相当随意的大学演讲中，他很难完整而清晰地阐释自己的世界观，并为之提供辩护。然而，这个演讲至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引言，用来导入他所倡导的可以免受过剩之灾的市场体系。凯恩斯清晰地阐明了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模式，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同时也有不可否认的缺陷。“在我看来，”他告诉他的听众，“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得到明智的管理，也许能够提供比其他任何已知的可供选择的制度更高的效率，并实现经济目标。不过，就其本身来看，它在许多方面是极为不可取的。”^④他设想，当个体独立进行经济活动时，应有一个公共部门进行有限但强有力的干预，以便改善可能产生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做那些个人已经在做的事，也不在于它是否做得更好或更差，而是去做那些目前个人根本无从去做的事情。”^⑤这种干预措施能够在不破坏市场机制基础和支柱的前提下，帮助缓解市场机制的失败。凯恩斯对市场机制提出了改进意见，他宣称：“在我看来，这些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依靠个人赚钱和嗜财本能的强烈吸引来作为经济机器的主要动力——似乎并非是水

① 请参阅凯恩斯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第44页。

② 同①，第38页。

③ 请参阅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第二卷，第225~229页。

④ 同①，第52~53页。

⑤ 同①，第46~47页。

火不相容的。”^① 对于凯恩斯来说，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市场生命的结束。他相信，市场机制这种模式仍将继续保留下去，但要对它有所约束。

凯恩斯这个演讲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预测性。事实上，它也是一个时代的奠基性的文件。这个时代的普遍共识是：市场需要广泛的监督。不过，从对凯恩斯的演讲的评论来看，就算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达到了顶峰的时代，对于他对自由放任政策所采取的相当“宽宏大量的”态度，经济学界内部还是有人表示了不满。^② 之后，大萧条开始了，公众对自由市场机制的支持迅速消失了。各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从采用新的关税制度，到放弃金本位制，再到实施大量的社会项目，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来概括，从而使“经济自由主义被摧毁了，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③ 很明显，由于未能预测到经济危机的爆发，与 10 年前相比，经济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从高空一下子坠落到了史无前例的低谷。^④ 在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们都确信自由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到最后，甚至连那些被认为是最坚定的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也是如此。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几封信堪称自由放任主义已经坠入深渊的明证。“甚至在这个国家，我们也不能回到自由放任的经济上。”1933 年夏天，在写给他一个同事的一封信中，奈特这样写道：“现在，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转向一个有约束的机制，这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一年年末，他又写道，他关注的唯一问题是“是否任何一种自由，尤其是消费自由与思想自由，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维持”。^⑤ 20 世纪 30 年代是这样一个年代，即使是曾经最强烈

① 请参阅凯恩斯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第 50 页。

② 请参阅：《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第 36 卷（1928 年），第 1 期，第 179~180 页；悉尼·韦伯的《自由放任的终结》，载于《经济学杂志》，第 36 卷（1926 年），第 143 期，第 434~441 页。

③ 请参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伦敦：迈克尔·约瑟夫-佩勒姆出版社，1994 年出版；纽约：雅致出版社 1996 年重印，第 94~95 页。本书引用时标注的页码系重印本页码。

④ 请参阅迈克尔·伯恩斯坦的《危险的进步：经济学家与 20 世纪美国的公共目标》，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 年出版，第 64 页。

⑤ 请参阅弗兰克·奈特在 1933 年 7 月 7 日写给查尔斯·蒂比茨的信，见收藏于芝加哥大学里根斯特因图书馆（Regenstein Library）的“弗兰克·奈特档案”（以下简称“Knight Papers”），box 62, folder 10；弗兰克·奈特在 1933 年 12 月 9 日写给爱德华·泰斯的信，box 62, folder 9, Knight Papers。

地倡导自由市场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有一部分人同意他们的立场必须做出某些实质性的改变。

不过，凯恩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这个演讲中提到的那些极具先见之明的预测，还是有一点最终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凯恩斯预测公众对自由放任观念的接受度会急剧下降，这一点他是对的；但是他认为这种变化将会是永恒的，在这一点上他错了。在大萧条时期，自由市场理念进入了一个反思与整顿的时期，但是它绝没有到完全终结的时候；恰恰相反，在这场经济危机爆发半个世纪之后所发生的故事，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说明自由市场观念再次凯旋。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盎格鲁-美利坚公共领域里的辩论中，盛行的假设已经变为自由市场的运作应该受到保护，以便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自由放任理论在经济学界重新赢得了最高荣誉。这不仅体现在人们大声疾呼公共部门全面回归本位；也体现在支持自由市场观念的政策研究机构，在慷慨人士的资助下不断涌现出来并发展壮大，而且彼此呼应，形成了一个日益繁荣的紧密团体；还体现在许多学术期刊、报纸，都已经接受了自己作为自由放任的公众传播者的身份。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都认为自己是自由市场的坚定的拥护者，他们援引信奉自由放任思想的杰出的哲学家们的观点为自己的政治理念辩护。^① 迅速消退的旧的经济世界的遗迹似乎反而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流行假设的这种演变是由许多事件促成的。直到现在，人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解释这个故事时的依据，恰恰是观念与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凯恩斯当初自信地声称自由放任理念正日益没落时所引用的基本理由。流行观念重新转向市场，

^① 例如，1981年，罗纳德·里根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上发表演讲时就说：“知识领袖们，例如拉塞尔·柯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亨利·黑茨利特、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路德维希·米塞斯，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想。”这一讲话见罗纳德·里根作的《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的演讲》，本文收录于里根的《言我心声》一书中，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96页。另一个例子是，197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视察保守派研究局（Conservative Research Department）时，打断了一个喋喋不休地宣扬“第三条道路”的演讲者，并往桌子上丢了一本《通往奴役之路》，然后说“这才是我们相信的东西”。这个故事源于理查德·科克特的《想人之所不敢想：1931—1983年间的智库与经济学反革命》，伦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74页。

这种现象发生在许多层面，而且许多人、许多机构都在其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超越国界观念的组织的全力投入，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凯恩斯认为，公共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干预经济事务，并成功地使这种观念传播开来。与凯恩斯的做法类似，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新闻记者和私人基金会组成了一个跨大西洋网络，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完全扭转政府的扩张态势，并且重塑公众对于自由市场的信念。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士，虽然远隔重洋，但都饱受大萧条与战争的磨难，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还将共同面对公众对他们的思想的认知隔膜，共同经历学术生涯上的困境与无数次政治领域的尝试的失败，不过最终，他们在政治制度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地位都将获得急剧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致力于构筑新的自由市场哲学，坚决相信他们抽象的理论观念拥有巨大的潜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借助于外部事件的力量，改变公共政治的面貌。这就是他们所建立的这个团体、他们所拥护的理念、他们试图重新构建的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朽遗产的故事。

在过去的30年里，尽管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是他们到底是怎样“王者归来”的？很显然，这是一个很难一下子叙述清楚的故事。许多年来，观察家们一直在努力并试图解释，对市场的颂扬与对计划的谴责在经过了一段休眠期之后，为什么能够重新支配众人的思想？又是怎样重新支配众人的思想的？^① 民众为什么会拥护那些看似对穷人更加不利的经济政策？对此，观察家们觉得难以理解。^② 他们还发现，

① 请参阅：艾伦·布林克利的《美国保守主义的问题》，载于《美国历史评论》，第99卷（1994年），第2期，第409页；迈克尔·卡辛的《草根右派：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新史观》，载于《美国历史评论》，第97卷（1992年），第1期，第136页。

② 请参阅托马斯·弗兰克的《为什么堪萨斯州如此重要？保守派是怎样在美国的心脏地带胜出的？》，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2004年出版。关于保守主义修辞中的民粹主义因素，请参阅：乔纳森·里德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崛起》，载于史蒂夫·弗雷泽和加里·格斯尔编的《新政秩序的兴起和衰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43~268页；里克·波斯坦因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巴里·戈德华特与美国共识的崩溃》，纽约：希尔-王出版社，2001年出版；丹·T·卡特的《愤怒的政治学：乔治·华莱士、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与美国政治的转型》，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主张保留各种社会传统的政治联盟内部很少有保持完全一致的时候——许多成员同时还支持自由市场制度，而这种制度却往往冷酷无情地、有效地破坏社会传统。^①对于这种现象，长期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些解释都只强调隐藏在政治观点与经济理念的抽象语言下的各种社会因素，包括人们在瞬息万变的文化与技术环境下对自己正在下滑的社会地位的担忧、在保住似乎正处于消失危险中的种族特权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没有种族偏见的语言体系的渴望。^②但是，对于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依然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因而，保守主义运动——它对公共辩论发挥了广泛的影响——的总体轮廓，至今还是很难完全描述清楚。

很少有人会质疑如下观点：人们对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的担忧和焦虑影响了保守主义运动，同时，它却又得到了许多不太可能从它的经济计划中获益的人的支持；并且，这个运动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同时倡导许多自相矛盾的观点。然而，上面这类解释，在理论分析的面纱下遮蔽了这个运动的一些重要的方面。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自已的论据还原为社会利益或物质利益，或者只是把它的论点“提炼”为高度形式化的原理，那么就很难被人理解和认同。经济人这个假设只有在作为一个形式上的抽象概念时才是有用的。在我们所阐述的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冲突，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一种止步于这一判断的解释，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认可。我们所体验到的社会环境是残酷无情的、复杂多变的；我们的政治生态是在抽象的理想主义、有目的性的策略行动、情绪化的倾向和直觉反应

① 请参阅：丽莎·麦克姬尔的《来自郊区的斗士：美国新右派的崛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63页；杰罗姆·希梅尔斯坦因的《向右走：美国保守主义的转型》，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45页。关于保守主义并不是一整套完整的观点，而是许多观点的综合体的论述，请参阅：乔纳森·舍恩瓦尔德的《抉择时刻：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兴起》，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8页；萨拉·戴蒙德的《通往权力之路：美国的右翼运动与政治权力》，纽约：吉尔福特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6~7页。

② 关于保守主义者对身份、地位的焦虑，请参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论述，以及迈克尔·罗金针对他过分强调大众政治运动中的非理性因素提出的批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伪保守主义的反抗》，本文收录于丹尼尔·贝尔主编的《美国新右派》一书中，纽约：标准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42页；迈克尔·罗金的《激进主义的幽灵》，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7年出版。

之间的动态的及不断变化着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们都是对那总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世界做出的临时性的回应。要想理解为什么个体会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要评价他们所秉持的信念的相对有效性，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承认他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的本质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近些年来，对于保守主义知识运动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和最有挑战性的那些人物，例如列奥·施特劳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惠特克·钱伯斯与安·兰德，已经出现了一些严肃的批判性的研究。^① 对于草根保守主义的发展、草根阶层的世界观，学界也表现出了持续的研究热情。^② 一些新的解释已经阐明了自由市场的主张与基督教福音派的教义得以有效结合起来的科学与文化的缘由。^③ 为那些有利于在公共领域培育和传播保守主义的制度和机构编写一部“编年史”，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但是现在，在这个方面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文献了，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20世纪，商人、金融机构、政治团体与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这

-
- ① 请参阅：史蒂文·史密斯的《解读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学、哲学、犹太主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凯瑟琳·朱克特，迈克尔·朱克特的《列奥·施特劳斯的真面目：政治哲学与美式民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布鲁斯·考德威尔的《哈耶克的挑战：哈耶克的思想传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迈克尔·金美奇的《转向保守主义：莱昂内尔·特里林、惠特克·钱伯斯与反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詹妮弗·伯恩斯的《市场女神：安·兰德与美国右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更早一些的一本著作，也是这个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是罗伯特·德威涅的《重铸保守主义：奥克肖特、斯特劳斯与对后现代主义的回应》，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关于法国和德国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中的重要人物的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例如奥利维尔·达尔德的《伯特兰·德·乔弗内尔》，巴黎：佩兰出版社，2008年出版；以及汉斯·荣格·海涅格的《威廉·罗普克：疾风骇浪中的一生》，斯图加特：谢夫勒-保事吉尔出版社，2005年出版。
- ② 例如，请参阅凯文·克鲁斯的《白人逃离：亚特兰大与现代保守主义的形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 ③ 请参阅：达伦·多查克的《从圣经地带到阳光地带：纯民间宗教、草根政治与福音保守主义的崛起》，纽约：诺顿出版社，2011年出版；贝桑尼·莫顿的《侍奉上帝与沃尔玛：基督教自由企业的诞生》，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项新兴的研究已经开始揭开了这个网络的面纱。^① 例如，已经有研究者阐明了冷战、兰德公司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崛起之间的关系；^② 保守主义者用来改变法律界的通常做法的制度性手法也被辨识出来了；^③ 还有研究者通过对《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发展壮大的轨迹的研究，揭示了“布道者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④ 日积月累地，这些文献代表着一种范式的转变，重新改写着保守主义运动的历史。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在转向保守主义的过程当中，思想观念和知识分子扮演着一个实质性的角色；同时，在保守主义者鼓动政治变革的过程当中，倡导这种理念的各种组织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⑤

本书一方面为这个仍然处在不断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尽力地提供一些修正。本书详尽地分析了许多保守主义观念，这种分析超越了思想传记的范畴，因为现存的思想大多依然囿于对重要人物之间的相互对话的记录。本书以思想交流的网络与交流的过程为焦点，对制度环境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不过并没有得出如下这种推论：在思想观念的产生与传播方面，制度环境表现出了支配性的力量。同时，本书也放弃了仅仅局限在某个国家的范围内近距离地讨论保守主义运动的通常做法，因为在研究保守主义运动的起源时，国界这个因素仍然不能不予以考虑。这样一来，呈现在读者

-
- ① 关于20世纪初金融市场与自由放任主义之间的关系，请参阅：茱莉娅·C. 奥特的《当华尔街遇见大街：对投资者民主制的追问》，第9章，《人民的市场》，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贝弗利·盖奇的《华尔街爆炸的那天：美国第一个恐怖时代的故事》，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关于商业组织与自由市场倡导者之间的关系，请参阅：金·菲利普斯-费恩的《看不见的手：保守主义从新政时代到里根时代的发展》，纽约：诺顿出版社，2009年出版；金·菲利普斯·费恩的《商业保守派与朝圣山学社》，本文收录于菲利普·米罗斯基和迪特尔·普莱维主编的《道路始于朝圣山学社：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诞生》，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280~301页；贝桑尼·莫顿的《侍奉上帝与沃尔玛：基督教自由企业的诞生》；爱德华多·卡内多的《现代美国取消管制运动的兴起：1957—1980年》，哥伦比亚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 ② 请参阅阿马戴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理性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 ③ 请参阅史蒂文·泰勒斯的《保守主义法律运动的兴起：控制法律之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 ④ 请参阅杰弗里·哈特的《美国保守主义的心灵的诞生：〈国家评论〉杂志以及它的时代》，特拉华州威尔明顿：ISI出版社，2005年出版。
- ⑤ 关于这个领域的文献，请参阅如下综述：《保守主义思想研究现状》，载于《美国历史杂志》，第98卷（2011年），第3期，第723~743页。

面前的这本书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就是：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信念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是如何解释并捍卫这些信念的；他们彼此之间是如何交替地相互影响和相互反对的；他们是怎样很好地掌控着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危险关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假设和观点又是怎样缓慢地、决定性地发生演变的。本书所要探究的这些观念，既不是在一个全然远离政治领域中自发展开的抽象概念，也不是用来引发一场某些人渴望发生的政治变革的纯粹工具。当然，抽象的观念世界与现实的政治领域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以及不可逾越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当中的那些主要代表人物引领大众前行时，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有时甚至是相当粗心大意地越过了这条界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多大区别。

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那个演讲的结尾部分，凯恩斯提醒听众，抽象的经济学理论的讨论往往会取代关于我们究竟愿意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的讨论，对此应该保持警惕。凯恩斯警告，不可以简单地把经济学问题与哲学问题割裂开来。他还预测，“在日后的年月里，最激烈的斗争与最深刻的观点分歧很可能将不再围绕技术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对立双方的争论主要都是经济性的——展开，而将围绕着另一些问题展开；这些问题，也许可以称之为心理方面或者道德方面的问题（如果这样表达恰当的话）”。^①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往往会出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如何用最有效率的手段实现特定的目标；另一个是这些目标本身应该是什么。某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们如果不密切关注后者并且在修辞上强调后者，那么就几乎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获得太大的成功。所有试图改变经济政策的变革者们，都必须拥有使社会成员的生活意义发生重构的能力；这种意义，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来，并且归结于这个世界。

早在大萧条时期，自由市场理念的倡导者们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无论是在学术机构内，还是在公共政治领域内，自由市场社会哲学能够吸引的支持者都寥寥无几。他们决意摆脱这种孤立局面。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构建起一个由同情者组成的网络，让他们互相协作，重新思考他们秉持的观念的哲

^① 请参阅凯恩斯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第50页。

学基础，并且重塑公众形象，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自己的观点呈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联系日益稳固，并且确定了定期召开会议、交流思想的场所，建立宣传政治立场的组织和机构，同时还涌现出了许多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的基金会。这些新出现的组织和机构大多是由“朝圣山学社”（Mont Pèlerin Society）的会员创办的。朝圣山学社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47年创办的，它的宗旨是为全世界支持市场制度的顶尖哲学家、经济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慈善家提供一个国际交流的场所。^①虽然一般学者并不怎么关注朝圣山学社，但是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现在所称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诞生的源头，同时也是由一系列政策研究机构精心编织而成的一个巨大网络的初始原点，这个网络在20世纪后半期推动了盎格鲁-美利坚的保守主义的复兴，并引领它重新获得了领导地位。^②在这个以市场为核心的现代世界的构建过程中，朝圣山学社的会员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朝圣山学社的会员们的早期论述进行一番细致的探究之后，我们会发现，与传统的自由市场主张相比，他们的观点远远没有那么教条和僵化。在战后，这些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朝圣山学社的早期会员渴望为自由市场奠定哲学基础，同时又对政治上的绝对真理深表怀疑，这种真理是未经确证的、不宽容的、不理性的。他们试图吸引宗教信仰者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因为他们认为，

① 关于哈耶克挑选朝圣山学社的会员的标准，请参阅《哈耶克教授关于大会的目标和组织的发言》，第4页，见加利福尼亚斯坦福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以下简称MPS Records），box 5, folder 13。

② 关于朝圣山学社的历史，请参阅：伯恩哈德·沃尔朋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关于“朝圣山学社”如何占领理论制高点的研究》，汉堡：VSA出版社，2004年出版；菲利普·普利克特的《转向新自由主义：关于“朝圣山学社”的发展和影响的研究》，斯图加特：卢修斯 & 卢修斯出版社；哈特韦尔的《朝圣山学社史》，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会，1995年出版；本·杰克逊的《新自由主义诞生之际的自由市场与强大国家之争：1930—1947年》，载于《历史杂志》，第53卷（2010年），第1期，第129~151页。关于朝圣山学社是如何为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发展提供制度性支持的，请参阅：理查德·科克特的《想人之所不敢想：1931—1983年间的智库与经济学反革命》，第100~121页；约翰·凯利的《把市场带回来：自由市场主义的政治复兴》，第2章，《市场自由主义的复兴》，贝辛斯托克：麦克米伦出版社，1997年出版。

19世纪的倡导自由市场的那些人错误地疏离了这两大人群，但是这些人其实是反对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的，也是反对由国家来进行再分配的。他们赞美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不过有时也会对它给文化和道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痛心疾首。他们尊崇自由，同时也认为集体道德传统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他们坚决捍卫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理论的资本主义，但同时也对政治民主的意蕴持很深的怀疑主义的态度。稍显悖谬的是，恰恰是他们相互之间的相似性，加剧了而不是弱化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观点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裂。

从大萧条的出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在经历着痛苦的紧缩，由此而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朝圣山学社的会员们必须全面反思他们在表面上公认的全部假设。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使他们确信，必须有一个能够超越自由市场抽象指令的全新的社会哲学；他们都同意，如果要想把资本主义从重重危机（它们正在削弱资本主义的根基）中拯救出来，那么就必须重建资本主义的核心假设。但是，当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涉及怎样确定资本主义秩序的哪些部分是可以被牺牲掉的，而哪些部分是可以被修正的，以及哪些道德准则是可以被认为具有绝对性的，并且用什么实施机制来保证这类道德准则的绝对性时，他们之间就出现了激烈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一直无法消弭。大西洋两岸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在讨论这些问题，他们热切地致力于探寻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社会的哲学基础。这种情况使原先的一般假设——保守主义计划从起源上看总是地域性的，从目的上看总是策略性的——不再成立。这一切，与其说是一个稳固僵化的世界观的产物，还不如说是原来的世界观崩塌所导致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自由市场的主张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集中体现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倡导者们无法在概念工具问题上达成共识。许多人都认为有关的概念工具已经过于陈旧并且含糊不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哈耶克就敏锐地观察到，“在今天，像‘自由主义’（liberalism）或‘民主’（democracy）、‘资本主义’（capitalism）或‘社会主义’（socialism）等术语都不再代表某个内在一致的思想体系了”。相反，在哈耶克看来，这些所谓的思想体系当中的任何一个，无非是“许多完全不同的原则和事实的聚合体”，是“历史事件”把它们同

上述字眼联系起来的。^①今天，如果我们继续依赖这些标签，就会犯“错置时代”的错误。例如，正如本书下文将会阐明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前几年，朝圣山学社的会员们在某些场合下偶尔会使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一词，显然，它在那个时代的含义与今天我们所赋予这个词语的含义全然不同。^②另外，朝圣山学社的许多会员都不熟悉“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这个术语，使用它的频率也相当低。不过，如果把“保守主义”（conservatism）这个术语的含义界定为保持他们想改变的某种现状的话，那么朝圣山学社的会员将会全体一致同意拒斥之。至于另两个术语，即“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只有在那不可预测的未来才会作为政治符号出现。朝圣山学社的会员们也尝试过重新运用“辉格主义”（Whiggism）这个术语，但是它的潜在底蕴实在过于古老，使他们这种努力的成效大打折扣。最后，“自由”一词原本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们的最爱，但是它的含义也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因为它被越来越多地与某种进步主义的世界观联系到了一起。在某些情形下，要想运用这些术语，同时又不扭曲它们在原先所属时代的原义，或许是可能的。例如，当朝圣山学社的早期会员们相信自己正在重构自由主义的基础（以防它在未来日渐衰微）的时候，或者在战后的美国，当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成了保守主义作家、决策者和游说者组成的世界中的一员的时候。^③但是，上述分类标签并不能掩盖如下事实：这些群体以及它们发出的声音，最根本的特征依然是不确定、不一致和不安的。如果我们想理解以往的那个时代的动态演变过程，我们就不能依赖当代哲学的静态概念。

更激烈的自由市场主张是在长期的斗争和辩论之后才出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经济危机渐行渐远，各学科的专业分工也变得

① 请参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真与伪》，《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年出版，第2~3页。

② 请参阅泰勒·博厄斯、乔丹·甘斯-莫尔斯的《新自由主义：从一种新自由主义哲学到另一个反自由主义口号》，载于《国际发展比较研究》，第44卷（2009年），第2期，第137~161页。

③ 请参阅乔治·H. 纳什的《1945年后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